



新中国60周年丛书

转折

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 《炎黄春秋》经典文章

● 改革开放亲历者的心声

吴思 李晨 主编

新华出版社

转折

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 主编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吴思，李晨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11-8789-8

I. 转… II. ①吴…②李… III. 改革开放—历史—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4809 号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责任编辑：贾晓伟 王 婷

装帧设计：伍民力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789-8

定 价：36.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10) 89203231

序言：站在新三十年的门口

杨继绳

无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无论是政治要人还是寻常百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中国 30 年发生的社会变革无不有着极大的关注。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在没有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实现了如此重要的社会进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历史活剧！融化了多少悲伤、壮烈、激动和喜悦！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问题！难怪不同国籍的作家、记者、学者们，纷纷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著述这将在人类历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迹的 30 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 30 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个 30 年，站在新的 30 年的门口，重新反思刚刚过去的 30 年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在 20 世纪这短短的 100 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 19 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也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20 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作出了种种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四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种实践。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



级的利益。为了实现其“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一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种实践。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验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是：1. 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2. 实行广泛社会保障制度；3. 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4. 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5. 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大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二战以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1929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邓小平同志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①通过人类在

^① 邓小平：《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9日，载《建设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4—14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二版。

20 世纪 100 年的实践，中国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

改革以前的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砍光烧尽。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 年，全国有 $\frac{2}{3}$ 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有 $\frac{1}{3}$ 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 30 年代。

处于工农差距有利一方的工人怎么样呢？以天津为例：1975 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 70% 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 41.5 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1950 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 3.8 平方米，1972 年，下降到 3 平方米。50 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 80 年代后期。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

为摆脱原来体制造就的危机，30 年来，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竞争性企业民有化，国有控股企业吸收非国有资本）；发展私有经济；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由单一公有的利益主体到利益主体多元化。

二、价格改革。由政府定价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三、建立市场体系、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四、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

五、宏观调控体系重建。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七、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源利用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连为一体。

改革大力推动了经济发展。30 年来，中国的 GDP 平均每年以 9.8% 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世界处于第三位。中国人口从 1978 年的 9.6 亿增加到 2007 年的 13.2 亿，增加了 3.6 亿，而人

均国民总收入（即人均 GNP）还是由 378.7 元增加到 19033 元，增加了 49 倍。改革 30 年，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 199 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突破 2000 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 175 位上升到 129 位。

最有意义的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 1958 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 1070 万吨，倾全国之力，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 1978 年的 3178 万吨，增长到 2007 年的 48966 万吨。从 2000 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30 年来，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进步：1. 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 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 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4. 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5. 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 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中国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甚至有的权力进入了市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 80 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60年了，这60年可以划分两个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后30年对前30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一个30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

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200年来，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的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目前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验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发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

就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

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历史的说法：“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使人明智”，“一个不能面对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等等。这些说法都向人们表明历史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旧时代，“私撰国史”是有罪的，修史是官家的事。因此，旧时代的史书大都是为官家歌功颂德的文字，存留民间的野史弥足珍贵。但野史由于著者条件的局限，有时失之偏颇和狭窄。这本书的作者中的很多人参与了改革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退休后经过沉静反思，其文章是在“处江湖之远”的晚年追思“居庙堂之高”的经历。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

这本书里所选的文章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又一个重大事件，发表于著名的历史类杂志《炎黄春秋》。《炎黄春秋》是追求历史真实的刊物，多年来，它既致力于匡正过去历史教科书的偏误，又致力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下的真实历史。这本书是从《炎黄春秋》中精选出来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应当是这本书的特点。

2009年3月

作者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目 录

序言：站在新三十年的门口	杨继绳(1)
--------------------	--------

一、春天 农村改革

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	田纪云(3)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	吴 象(20)
“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来龙去脉——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	吴 象(28)
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	张广友(44)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围绕包产到户的一场新旧 思想斗争	许人俊(59)
几乎中断“包产到户”的张浩事件	李克林(75)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陈大斌(85)

二、海风 对外开放

在马克思的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	柯 华(97)
昔日大寨的一次思想大震动	冯东书(102)
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田纪云(105)
最高决策：中国创办特区始末	倪振良(111)
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	张根生(138)
谷牧与袁庚：创建蛇口工业区的幕后台前人	鞠天相(143)
改革开放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	张汉青(152)
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关 山(157)



1984 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	何云华(174)
深圳特区建设中的梁湘	张天来(186)
1992 年一次不平凡的随行采访	雷仲予(199)

三、铭记 回忆领袖和战友

近距离感受邓小平	田纪云(207)
走近邓小平	于光远(218)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	田纪云(228)
我心中的耀邦	胡启立(237)
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	田纪云(251)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	丁龙嘉(263)

春

—— 农村改革

天

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

◎田纪云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真正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农村迈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虽然开始时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但由于它顺民心，得民意，故犹如长江之水，滚滚东流，不可阻挡，不可抗拒，迅速普及神州大地。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不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全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解决的衣食温饱问题，而且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现在如实地回顾一下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分析一下它的伟大意义，将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农业和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

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都是以耕种土地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中国农民的本色。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和大部分耕畜、农具，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占有20%—30%的土地。广大农民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忍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可以说，“耕者无其田”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基本原因。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依靠“打土豪、分田地”调动广大农民参战的积极性，所以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堵，实现两万五千里长征，顺利到达延安。在抗日战争期间，依靠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参战、支援前线的积极性，使抗日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打垮国民党几百万军队进而解放全中国，在很大



春
天

程度上是由于在广大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参战、支前的积极性。可以这么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武装起来的农民取得的，而农民参战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保卫胜利果实——土地。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是依靠农民打下来的，农民的功劳比天高、比地厚！

但建国后农民的命运又如何呢？

建国前后，即从1947年到1950年，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实现了祖祖辈辈所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放鞭炮、扭秧歌、唱大戏、玩龙灯，一派喜气洋洋，庆祝自己的胜利。他们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我自己于1946年下半年，即解放战争开始后也曾任在山东朝城县一区任土改工作组组长，目睹了土改给农民带来的喜悦和争相参军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情。



1981年，兰考县委在三中全会后，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使全县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华社稿）

经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得解放，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是解放初期能够迅速战胜困难，恢复经济，并顺利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

计划的最重要因素。

土地改革初期，适应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不好”情况，大量出现了变工队、耕田队、互助组等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他们为军烈属代耕，为鳏寡孤独帮忙。这种互助合作组织的宗旨是“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和民主管理”，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应该说，这种形式对当时贫穷落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农村来说还是需要的，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然而，好景不长。1952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提出，要适当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这样，原来的互助组很快变成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文件规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实际上是入社并非自愿，退社更不自由。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农业要走由初级社到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路子，合作化的步子进一步加快。1955年夏，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邓子恢（主管农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人是阻碍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的“小脚女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更进一步助长了已经存在的急躁冒进情绪，高指标、浮夸风大大加剧。就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把总路线中说的“相当长的时期”变为了“相当短的时期”，把“逐步”变为了“跑步”，快了又快，初级社还未建起来就搞高级社，高级社还未搞起来就搞人民公社。谁慢了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小脚女人”，并把在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阶级斗争”，就要批，就要斗。因此，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6年末，在3年时间里就在全中国范围实现了高级合作社，把农民刚刚得到的土地、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都“归大堆”了，“共产”了。虽然《决议》上也说对入社的生产资料要折价，要赔偿，但实际上既不折价，更无赔偿。用农民的话来说：“刚分到土地屁股还没坐热呢，又被收走了”，“不仅把土改时分来的土地收归公了，把我们自己原有的土地也充公了，牲畜和农具也都统统归公了”。

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了要用15年或20年至30年的时间，在工业生产和经济上“超英（国）赶美（国）”的目标。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确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期。在经济计划中搞“第二本账”，鼓励高指标，互相攀比。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指导下，各地竞相放农业生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的丰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并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有的地方放出的水稻“卫星”亩产达6万多公斤，小麦“卫星”亩产2万多公斤，花生“卫星”亩产1.5万多公斤。工业战线则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8月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听取了汇报后